



名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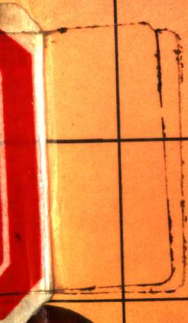
人
王

眼
瞇

中



梁欢 编
华艺出版社



名

王

瞇



中

眼

王

朔



华
艺
出
版
社

名人眼中的王朔

——
梁
欢
编

(京) 新登字 124 号

名人眼中的王朔

主编：梁 欢

出版：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28 千字

印张：6.125

版次：1993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

书号：ISBN7-80039-769-6/I·321

定价：4.

代 序

一九九二年，爆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热点——“王朔热”之后，眼下似乎沉入一种冷寂。王朔的众多推崇者、评判者、合作者、关注者，都在这种悄然无声中，急切地注视着王朔，揣测着今天的王朔和明天的王朔，是在：蛰伏？冷却？酝酿新的火爆？或者：反思？定位？再出惊人之作？做为王朔版权的授于单位，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他更为不负众望的新作。在出版这本《名人眼中的王朔》时，我们采访了王朔，并以此做为本书的代序。

问：去年底以来，各种传媒和民众对你及你的作品评论较多，褒贬不一，这是否影响你的创作心态？

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多数是对以前作品的批评，现在要写的是我经过长时间构思、和以前的东西有某种程度的不一样。批评不会干扰我目前的写作。当然，技术上的某些校正是需要的，比如语言的风格化是否过度强烈？不同身份是否要操同一种语言？这些技术上的批评我当然会注意调整。但是，我不会因为人家夸我，就飘飘然；人家骂我，就自认为一无是处，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不致于受到别人看法的影响。

问：现在有本书的书名叫《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不是有点涉嫌人身攻击？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王：听说现在海南就流行这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当然要真按“诽谤”“污辱”来看，大概也基本构成。但是我自已觉得无所谓。也可能是受钱驱使，为了好卖，并不是成心污辱我这个人。另外，这句话是在我某一小说里，用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说的话。用作书的标题，我觉得也是故作惊人语吧！我倒并不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对我的一个评价或者完全针对我个人的。

问：现在，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文学圈中的一些“大腕”比如萧乾、王蒙等对你的作品多有褒扬，对此你怎么想呢？

王：我对这些评价感到受之有愧。因为我觉得搞创作的人应在他创作生活全部结束后才可能有一个综合性评价。我目前的创作我自认为不能说刚开始，也是刚刚走完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不足，也有很多的优点。前辈作家对我进行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了我。我觉得我最好的回答是：写出一部有更大提高的作品。

问：一些读者、一些观众从你前一段的小说、电视剧中得出一种推断，说：“王朔才尽”了，你听说了吗？

王：我觉得这就跟骂人似的。就好象冷不丁碰到你，骂你一声：“流氓！”“讨厌！”我自己的创作我当然很清楚。我认为我在小说创作中，现在属于往上攀的阶段，有可能上去，但也有可能上不去。上去我会提高一块，上不去之后，再说我“才尽”也为时不晚。关于创作，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有高潮有低潮。每一个创作总要面临一个准备阶段或者称冷却

期吧。我不认为我才尽了。

问：许多人都认为你为人为文非常潇洒，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走自己的路。但是现在评论很多，是不是会影响你的洒脱，使你在创作等方面变得拘谨？

王：没有。实际上我在为人上一直是比较老派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基本上遵循我们国家固有的人情关系，而且我还算很世故的一个人，从来不无端地去挑衅，去冒犯别人。只有在互相能够明白的情况下，我才会把真实的意见告诉别人。但在创作中必然要保持某种锋芒，这种锋芒也许不在表面上，不在语言上，不是那种泛滥的、逮谁骂谁的东西。这个调整我是肯定要做的。以后的创作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那种所谓顽主世界之类了。语言风格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风格的变化不代表锋芒会丧失，我会在其它方面保持我的锋芒和纯洁。

问：去年你的创作的被公众认可——或者说“王朔热”“王朔现象”，不管怎么表述吧，是达到一种颠峰状态。不夸张地说，这种“火爆”情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语言渗透力，包括一些批评你的朋友，也在不自觉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谁比谁傻多少”、“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又比如：攒一道活；灭你这小子；透着是一家子；饶了无产阶级吧；开涮等等，似乎形成了一种民间社会新的口语风俗。你是否意识到自己语言的这种功力？

王：这个我自己很难评价。因为这种语言在我个人生活中俯拾皆是，这都属于劳动人民的智慧、一种生活的结晶。它通过影视、小说传播开来被大家迅速认可。大概仅此而已吧。

问：现在社会、民众已经认可你的这种特色语言。你有没有直觉到这种语言会不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能不能捕捉更新的语言？

王：我不想过份下功夫捕捉新的语言。因为这种东西当时我也是本能地使用的。因为熟悉才使用的。如果它一旦变得对我来说陌生了的话，费劲巴力去熟悉它，那倒不对了。新的语言应该有新的作家代表。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想今后一定有他们的代表性作家出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他们会熟练、自如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我觉得我不能犯那种错误，象一个老的女演员扮演少女似的。我一旦脱离了生活中的东西，就非露怯不行。有些理念上的东西是随着经验积累而变化的，经验越丰富语言会使用的越得体，但这种活生生的东西，只能身处其中才能彻底捕捉到。如果不是这样，光靠敏感去捕捉，比如：年龄很大的人强努着去写年轻人，或者年轻人强努着去写老年人的，总给我不伦不类的感觉。所以，我承认我自己的局限性，我就是在这种局限性里，把我能发挥的东西发挥到极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可能代替别人来创作。

问：那你不怕失掉一部份读者？

王：我想无所谓吧！因为读者的获得或失去，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写。如果吻合了，我获得了就获得了，要失去也没办法。反过来说，你就是拼命想争取读者，恐怕也未见得能争取到。这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的事。靠做噱头、做出媚俗的姿态来，读者恐怕也不理你，失去恐怕是绝对的，但失去的同时可能还会获得。因为起码仅仅为我的同龄人写作就足矣了。他们不会全都死光了。我

有幸生在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

问：前不久听到一个令人大为吃惊的消息，说是你在找工作，有这回事吗？

王：有这种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因为我长时间脱离组织，不大好意思。现在我在写一个很长的东西，要用很长的时间。如果有个工作作为参照的话，我的写作可以保持在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创作上，不创作出来就不行，毕其功于一役，生死荣辱全集中在创作中，我自己会感到有很大压力。如果有一个退路摆在我面前呢，把创作变成一种业余的、趣味性的、自身的爱好，那么对作品会有好处。我并不是要找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写作，也希望找一个和社会的接触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否真找，是否真的去当个“上班族”，我目前还没有完全想好。

问：我们听说现在很多单位热情相邀，希望你去，并争相让你挑担子，是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最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王：我其实并不想负任何责任，就想找一个光拿钱不干活、上班聊天的地方。这样我想别人就很难两全了。别人希望我去发挥一定作用，可是我确实自认为我责任感不是太重，我不愿意挑担子，很怕累，因为毕竟我不想真正影响创作。比如要给我一摊事，我脑子就要搁在那摊事上。我还是希望找一个轻松的工作。

问：你现在是不是在写《残酷青春》五部系列？

王：现在还不能过早定下名子。最后定名要看写完的东西，用什么名字比较吻合吧！今年还有些电视剧、电影，夏

网拍《无人喝采》、何群根据《枉然不供》改编成《消失的女人》，还有八集电视连续剧《过把瘾就死》。姜文要拍《动物凶猛》，在物色演员。电视剧一般不自己写，但是策划、合作还会有的。

问：你在小说创作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构思，用你自己的话说是不是找着“范”儿了？

王：今后的小说创作会有些调整。我觉得过去有些真切感受的东西，老实讲并没有在创作中使用过。当时受一定篇幅的限制，只是零碎的使用了一些，原来写小说基本上是写生活中或者耳闻目睹的一些孤立的故事。但是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时间、年代跨度才能看出影响和结果的。这种东西就必须要有规模的、大的长篇小说才能容纳得下的。我现在就在寻找这个东西。我感觉有些东西是在变，过去认为很正确的东西现在不是那么正确了。过去认为很讨厌的东西，现在看出还是有它的原因的，有它存在的理由的。过去创作中容易对真实事件的看法产生极端。实际上一极端了就看不出它后面的一些实质性内容了。过去没太注意真实与真实的区别，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的。

新的小说，我想取一种更新的视角。过去我的小说是趴在地上看人家，现在希望尽可能站到人家背后或者站到我自己背后，特别是站到自己的背后。我想看看我自己背后是什么东西。过去我基本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对立面来写，这样我对自己的描写一般都是正面的。可是我觉得我的后面还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甚至不为自己知道的真实形象。那个形象有时感觉得到，但要真正捕捉到、勾勒出来，还要费很大的功夫。自己看清自己比较困难。可以把别人看的过高过低，过

好过坏，对别人随便下一个判断。我的新小说要对自己下个新判断，包括别人对我的众说纷纭，我认为多数还是没有说清楚。

问：过去从风格上看，对正统的反叛色彩较浓，今后你的作品是否考虑过调整？

王：我自己觉得我不属于反叛，只不过是一种矫情和虚头巴脑，装饰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希望把真实的这一面写出来。所谓反叛只能说是对虚伪的反叛，对不诚实的反叛。真实的东西我认为不存在反叛谁的问题，它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存在。我们、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社会真正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是一种诚实。大家好象习惯于一种伪装的东西，你要把伪装的东西捅它一下吧，大家就会认为无法接受。似乎就要用一种非常脆弱的、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东西联系。我认为人和人之间不能靠这种虽然美、但却不真实的东西来维系。真实的东西尽管有时显得很可怕，但应该认识到是不可避免的。人都有弱点和劣根性，应该在互相认可对方不是完人的情况下进行一种新的联系。我希望把这种东西写出来。我现在三十多岁了，我已经感觉到一种命运的力量。我总觉得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受到很大命运力量的支配的。两个人在一起或者分开都受到一种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轨道是不相交的，可能在某一点上会相交，但最终是要分开的。我自认为对生活是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我想把这种东西搬进小说，我这样去重新记述生活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会比过去更有真实性。

问：你的这种新的创作内涵在表现形式上有什么新的想法？

王：这要看我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什么方式。我不会去用一种统一的风格，我认为任何一种程式化的表述都会有限制作用。可能在描述某个故事、某个特定的环境时用某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但是在与此相关的下一阶段生活里可能就要换一种。我的方式大概会是包罗万象的。比如一些特别不成器的导演往往会强调使用一种风格，真正大器的导演都是为我所用，不管是否过时、是否老派。文学描写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必用什么现代的、保守的、古典的去限制自己，需要用什么手法就用什么手法，不必忌讳什么。

问：听文学圈里的一些朋友说，你非常推崇几位作家近期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纯文学中更趋向理念性的，是不是你今后的创作风格也要有所变化，向纯文学靠色？

王：这不一定。因为欣赏别人的创作和我自己的创作应该分开来看。我可以欣赏跟我完全不搭界的，甚至跟我距离越远的东西我越欣赏。而我自己的创作必须根据我自己的实力和局限性来考虑。比如我非常喜欢王安忆的作品，但我不可能象她那样创作。因为作家个人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要象她那么写，就等于是扬短避长。很多跟我不大相同的作家，我都是非常欣赏的。那种欣赏仅仅是出于一种读者的欣赏，比如王安忆关于文学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对我有很大启发。像她认为故事是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作家的的工作只是象雕塑一样把多余的石头给去掉，我认为的确是这么回事。还有象史铁生的很多东西，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他说了很多实质性的东西。这仅仅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大量的看别人的东西。这种风格差距越大的作家，越给我一种非常喜欢的感觉。

问：你今后会不会在小说里加进大段的哲理性议论？

王：不会的。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是不能没有的。另外，我当然还尽量地使描写的东西具有画面感、运动感。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部停掉，进行大段的心理的、隐密的发掘。这些东西可以在某一章里使它突出一些，但不能通篇这样去写。心里的感觉就象毛一样附着在皮上，附着在人物、情景、气氛中。我觉得单拎出来写，别人可能很难理解。小说毕竟要有它自身需要尊重的形式，这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

问：有人称你是“造星人”，你的电影、电视剧一经上演，便有一批“一举成名”者。特别象葛优、梁天、谢园，还有英达等，似乎很适合出任你的剧中角色，是吗？

王：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十年中有了很大变化。或者说一直就是这样，只不过过去被曲解，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另一种精神面貌：箭拔弩张，吹胡子瞪眼，实际上中国人的奋发向上的形象现在只是被真正反映出来。我在作品中有所表现。您说的这些演员以一种新的形象（很多人称之为丑星）实际上是以一种普通面目出现。过去选演员都要找“适合工农兵”的。现在对人民的认识不是那么简单，认为人民是由工农兵构成，剩下都是一小撮。人民中有形形色色的，象葛优、梁天这样的，说受到人民的爱戴一点都不夸张。人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就象自己家里的一个亲戚、一个熟悉的朋友。不是那种漂亮的已经不真实了的。今后恐怕还要有英俊小生，但一些真正描写中国人生活的片子，恐怕还是要具有普通中国人像貌的。另外，他们使用的语言当然也有很大关系，虽然有地域限制，但都是挂在嘴边的，我们叫它“人话”。这些演员用这种普通的面目，说着这种普通的话，而且话里显出一点机灵来，就得

到大家的喜爱。

问：将来的新作还是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吧？

王：完全可以。但是能不能写好，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我现在确实不需要什么急功近利的东西。过去的成功给我带来一种很好的心理状态，就是可以毫无负担地写作，可以体面的、自由的写作。我要写出对得起我自己的东西。现在有许多跟我同龄或比我在先的优秀作家，事后评论这段文学活动，谁也不是主角，大家都是在共同努力，创造了灿烂的文学成就。我认为现在的好小说是空前的多。不能认为读者散失了一部份、影响相对缩小就不承认现在的文学成就。文学成就的衡量毕竟不是最终以读者数量的高低评判的。各种形式、各种特点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今天我自认为是一种繁荣的局面。只不过这些小说没有被做好，这是营修过程问题。现在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它们还没有完全打开市场，许多好的小说不为人知。现在社会心态普遍比较浮躁，挣钱的欲望超过阅读欲望，包括其它艺术形式，比如电视啊，这些形式比较有力地在争夺读者、争夺文学读者。这和京剧是一个道理，京剧的魅力不能因为观众少了就贬低它的自身艺术价值。小说相比较电视而言，同样处在少数位置。但这个少数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另外，小说毕竟是所有电视电影的基础，所有艺术的基础。我想做为一个普通市民可以不看小说，声色犬马过一辈子，但任何搞艺术的人，搞音乐、搞美术的人，要想有成就都要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所以文学这种东西，起码在我的有生之年仍然会保持这种稳固和强大的地位。

目 录

代序.....	(1)
躲避崇高	王 蒙 (1)
我所认识的王朔	王海鸰 (11)
王朔现象的历史与文化透视.....	马立诚 (26)
我读王朔.....	冯 巩 (56)
谁戒我也戒不了这一口.....	冯小刚 (60)
愿望和生活不能错位.....	叶 楠 (62)
不吝恶名.....	叶 鹏 (66)
“各色”王朔	白 烨 (79)
此时此刻此身此意.....	刘心武 (86)
刘震云谈王朔.....	刘震云 (89)
如果没有王朔.....	刘梦溪 (91)
与历史合谋.....	池 莉 (98)
王朔很“火”	李国文 (109)
玩幽默与品幽默	陈建功 (113)
王朔的语言	英 达 (116)
玩的不是文学	张抗抗 (121)
意外地收到美容效果	周 展 (128)

接着侃你的，王朔	范荣康 (132)
病人看见不卫生	吴 欢 (137)
希望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挫折	萧 乾 (146)
我敢说 I 懂王朔	梁 左 (148)
杰出青年王朔	梁 天 (153)
执着到否决，洒脱与沉重	梁 欢 (159)
王朔是块才	谢 园 (172)
王朔也在变	葛 优 (174)

躲避崇高

王 蒙

“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有一种讲法是至少在运笔的瞬间要“升华”到高境界来。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据说是这样。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更真、更善、更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或者认为理想已经实现，现实即是理想，那就是赞美新的现实今天的现实与批判旧的现实昨天的现实的激情。作品有着一种光辉，要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人间；那是作者的深思与人格力量，也是

时代的“制高点”所发射出来的光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做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灵魂的蛀虫），点燃自己的心，照亮前进道路上的黑暗与荆棘……等等。这些话我们不但耳熟能详也身体力行。尽管对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们的作家意见未必一致，甚至可以为之争得头破血流直至你死我活，但都自以为是，努力做到一种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在读者当中，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无近年来的政治附加含义）形象，高出读者一头的形象。当然也有许多人努了半天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牵强地、装模做样地、乃至做伪地也摆出了这样的架式。

当然，在老一辈的作家当中也有一些温柔的叙述者，平和的见证者，优雅的观赏者。比如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乃至部分的谢冰心。但他们至少也相当有意识地强调着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温馨、教养和洁净；哪怕不是志士与先锋直到精美的文学，至少也是绅士与淑女的文学。

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分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